

壹、前言

自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「改革開放」政策後，中國大陸逐漸融入全球化的發展體系之中，除國家經濟與貿易向世界範圍迅速擴張外，其高等教育也為因應世界潮流而著手進行改革。1999年1月，國務院提出《面向二十一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畫》，強調國家綜合競爭力將取決於教育發展、科學技術和知識創新的水準，同時宣佈實施「高層次創造性人才工程」，提出2010年高等教育入學率達到適齡青年15%之新目標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，1999）。同年6月，國務院發出《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決定》，正式確立了中國大陸高等教育擴招政策，奠定高等教育朝向大眾化（mass higher education）的發展方向（中國教育年鑑編輯部，2000）。繼之，2001年3月，國務院頒布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畫綱要》，宣布提前至2005年實現「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15%左右」之規劃。而根據《中國教育年鑑》對的統計，國內高等教育毛入學率自1999年後確實出現了明顯加速的趨勢，並於2002年提前達到15%毛入學率的大眾化目標（中國教育年鑑編輯部，2004）。

事實上，高等教育的快速擴張為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全球普遍的現象，各國為因應世界經濟與社會型態的轉變，競相發展高等教育來提升本國人力素質，加速國家現代化（戴曉霞，2000a）。而學界對於「高等教育大眾化」的討論，首見於美國學者Martin Trow（1974）對全球高等教育發展的研究。他依各國適齡青年進入大學的比率，將各國高等教育發展區分為三種類型，包括：菁英型（就學率低於15%）、大眾型（就學率15% - 50%）以及普及型（就學率達50%以上）。誠然，回顧國際社會高等教育發展經驗可知，高等教育一開始只為少數政治與經濟菁英服務，其功能亦僅限於培養社會領導人或特定專業人員；而隨著就學率逐漸提升逾同年齡層學生的15%，大學教育功能亦變得多元；當就學率超過50%時，則意味著全民均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，高等教育的定位亦從培養菁英轉化為培養適應社會的國民（楊思偉，2000）。不過，高等教育大眾化促進各國經濟發展、提升公民意識、加速社會流動的同時，學生人數的躍升和教育經費的增加，亦成為各國高等教育體系改革的龐大壓力（Dougherty, 1997）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近年來中國大陸已躍升為全球發展最快速的經濟體之一，其高等教育政策改革有其經濟發展需求的考量，而整體人力素質的提升，更成為國內經濟能否永續發展的重要關鍵，甚而牽動著區域與全球政經秩序。是以，關注中國大陸高等教育政策的發展，有助於研究者從中辨析其國家整體發展策略，進而掌握全球政經情勢的動態。另一方面，我國在少子化衝擊下，高等教育正面臨